诗与现实的平衡*

——九叶诗派诗论研究之一

□ 张岩泉

摘　要:九叶诗派20世纪40年代的理论思考紧紧围绕"探索现代诗的中国道路"而展开。他们寻求诗与现实的多重平衡,这一"共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他们认为诗要扎根于现实,但又不能拘泥于现实,现实具有超出纯粹政治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其二,他们认为诚挚的诗人应该融合社会意识与个人情感,成为沟通"群众的心"与"个人的心"的历史个体;其三,他们认为艺术有自身的价值与绵延的传统,好诗在反映现实之余理当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九叶诗派的"平衡"诗论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论的某些不足。

关键词:九叶诗派;诗论;平衡;20世纪40年代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02-0126-07

九叶诗派20世纪40年代的全部理论思考紧紧围绕"探索现代诗的中国道路"这一轴心而展开。他们从"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角度延续"新诗现代化"的历史思考,其诗学观念从两个方面丰富地展开:在文学与外部关系的认识上,主张正确处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追求诗与现实的平衡;在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上,倾向接受欧美现代诗歌艺术和中国新诗传统的成功经验,建立新的适应历史发展的抒情模式和表现体系,即袁可嘉当年指出的:"我只愿意着重指出这群来自南北的年轻作者如何奋力追求艺术与现实间的正常的平衡……通过强烈的现代化的倾向,而确定地指向诗的新生。"①本文侧重探讨九叶诗论的第一个层面。

一点共识:多重平衡

"正常的平衡"是九叶诗派形成时的共识。从历时性的观点来看,他们相继从超然于时代过渡到介入社会、干预生活与突进现实。这里"时代、社会、现实"指重大的历史变革与普通的人民生活,艺术反映现实主要指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对涌动着的时代主潮的迫近。就超然一面大致区分,步入诗坛初始,南方诗人更多耽于身边悲欢的吟哦而忽略了对时代风云的抒写;北方诗人在西方诗艺及文化思想中浸渍较久较深,因而挖掘深心作超验的形而上深思的时候多一些,相对地漠视了对现实苦难的刻划。姿态虽然不一,但对己身之外的广阔世界(人类社会)一定程度的隔膜与冷淡是并无二致的。《诗创造》取兼收并蓄的编辑方针,但对"抒写大众疾苦,战争惨象,暴露黑暗,歌颂光明"与"仅仅抒写一己的爱恋、悒郁、梦幻、憧憬"的同样肯定,对"山歌、方言诗、商籁体、玄学派的诗,及那些高级形式的艺术成果"②的一般珍爱,从中不难看出一视同仁中的偏嗜偏爱和保护下的鼓励提倡,从内容到形式对九叶派诗人早期的多愁善感和苦思冥想无异公开的默许,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九叶诗派综论"(编号CCNU12HO1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岩泉(1962—),男,江西黎川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理论的追认。

生活改变人。水深火热的民众生活、血雨腥风的社会现实、抗争不息的时代形势撼动着诗人的灵魂,同时深化和升华了他们对诗与现实的认识。辛笛回忆:“是啼血的布谷使我领悟到古中国的凡鸟在时代中的啼鸣,必须把人民的忧患溶化于个人的体验之中,写诗才能有一定的意义”③;陈敬容从青春的悲剧中振作起来,一无顾惜地“让小儿女的哀愁”流去,凝聚全力守候“一个共同的黎明”;唐祈休止了牧歌行吟,自漫游中加入向现实突进的行列;唐湜自愿如诗中“男女主人公必须进入现实的考验”;郑敏、穆旦也将搜索天空的目光扫瞄弹痕累累、疮痍遍布的大地。1948年他们为新旧交替的时代欢欣鼓舞,集体致辞:“几千年来在地下郁郁地生长的火焰冲出传统的泥层了,它在大笑着、咀嚼着一个世界,也为这一个世界吐出圣洁的光焰”;④诚恳祷告:“我们愿意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最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从各方面来参予这艰苦而光辉的斗争,接受历史阶段的真理的号召,来试验我们对于新诗的写作”,⑤不再视写诗为一己生命的投掷,与人无涉,而是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休戚与共。唐湜的理论转向具有“个案分析”的价值。在猝遇肌肉弓起的“搏求者穆旦”时,他为那“丰富的痛苦”的艺术世界(苦闷的象征)惊异得难以自已,推许穆旦为“中国少数能作自我思想,自我感受,给万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⑥的诗人之一,称道他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成”,而诗人的“发展”观包含了超越相对时空(人类空间)进入宇宙时空的要求,“完成”观包容着归返人类故乡(原始素朴的自然状态)的意思。诗中的“历史”与“自然”分指人类社会与宇宙时空,评论者知道,诗人“历史还原为自然”的观点只是朴素的唯物论,尚非辩证的历史观,但他仍尽量宽容地赞赏了这种“完熟的超越哲学”。一年后,唐湜在评述郑敏时,拿W·斐德(walterpeter)论爵基阿勒画派的话比拟其诗作,说“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创造了一种瞬间(神圣时间)艺术,激赏良多;最后却笔锋一转,归结为:“但我们仍不能不说:这仅仅是过于绚烂过于成熟的现代欧洲人思想的移植,一种偶然的奇迹,一颗奇异的种子,却不是这时代的历史的声音!”⑦已经沐浴在时代暴风雨中的诗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对过去执行着严格的自我批判。

一时代有属于一时代的提问方式与提问中心,九叶诗派面对的是斗争激烈、形势突变的20世纪40年代的时空,这一时期占压倒优势的理论导向是要求在诗与现实之间必须有所侧重、有所割舍,在诗的艺术性与战斗性之间作出不能两全的选择。他们瞠目于历史上“为艺术而艺术”的虚妄,更怵心于时下一些偏狭的理论风气的甚嚣尘上。他们既不愿看见天平的两端失重或错位,转而寻觅两极之上的合理平衡;也不忍目睹诗与现实在非此即彼中拼个鱼死网破或两败俱伤,致力拓垦二者“结合部”的开阔地带,他们热爱人生又眷恋艺术,“有想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的一致心愿。”⑧

“平衡”是九叶诗派认识和外理诗与现实复杂关系的其本准则,它包括三个内在相关相辅相成的方面:审美客体的“现实观”,审美主体的“诗人论”,审美生成的“艺术学”。

追求综合:现实观

九叶诗派将“现实”标举为“综合”性诗学体系的第一要义。这一概念大大突破了以往现代派诗潮的“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历史局限,也以对社会现实的广泛含纳有效地回应了时代对诗歌提出的正当要求。早前,九叶诗派的师长辈诗人兼理论家,借介绍西洋诗的新趋势来谈论国内文艺新变化时就指出:“最近百年来西洋文学里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扩大了文学里的社会性,虽然一方面有纯诗运动,有极端个性的尝试,多半的作品仍然还是根据各种社会现象来表现人生的。我们的文艺似乎也向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希望,从事文艺的人也在同样的开发一个新时期。”⑨这是新路向,也可谓坦坦荡荡的正途。九叶诗派虽然多栖身于学院和文化出版机构,但耳闻、目睹、身历的颠沛流离、国情民瘼无时不刺激他们和惊醒他们,此时他们最感亲切的是奥登、史彭德、阿拉贡、艾吕雅等沾染战地风尘、散发人间气息的“粉红色诗歌”。袁可嘉结合时代的不断变化一再强调,现代诗人的作品中除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是诗艺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术成立的前提），还存在着“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这是诗艺术突破自我的保障），“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10]只是“现代的诗（以及一切艺术作品），首先得要扎根在现实里，但又要不给现实绑住”，追求诗歌表现现实的深刻性和立体性。

当时，九叶诗派屡受责难，比如“不够前进”、追求唯美”之类，批评家认为他们的创作没能贴近现实，楔入时代，并进而讴歌政治革命。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以及在作品中不同的表现。九叶诗派的现实观在40年代独树一帜，他们反对把现实理解得肤浅而狭隘，也不赞同对现实作教条主义的解释与规定，更反对借强化现实性之名，来排斥或贬低诗对艺术性的追求。他们的现实观具有立体开放性的特点。

有破有立，破立结合。九叶诗派批评了三种似是而非的“时代现实观”，相应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其一，只从字面上和题材表层寻找现实性战斗性论据的做法，其二，将广阔的现实限义为单一的政治内容的观点，其三，以反映“本质现实”取代表现“现象现实”的议论。“标语口号诗”是“其一”适例。它们堆砌政治概念，空喊干叫口号，以观念说教代替艺术表现，艺术感染力很低，在新诗史上历来是各派批评的对象，但在40年代光明与黑暗交汇的特定年代，却有人仅仅从标语口号所体现的政治意识中认为富于“时代感”。这类诗从创作态度上说只有政治激情而无艺术冲动，“专门要说它们所没有的，结果内容形式两皆说不上。剩了付空架子。”[11]他们还以为反映现实不能只从一首诗的表面字样上去苛求而应把握其丰富复杂的本质。因而九叶诗派所体现的“现实性”远非口号诗人呼喊的“时代感”，它包括着社会现实、文化现实、心理现实的内涵。政治构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是重要的一部分，但从来也不是全部。有人断言：“一切的战斗的现实内容，也必然是政治内容，不管是抒情，不管是叙述，不管是‘政治诗’，不管是山歌，总是政治内容的。”[12]这段话纰漏甚多。单从逻辑上讲，作出推理之先省略了“一切现实生活都是政治内容和诗反映现实”这样两个前提，把命题简单化、绝对化及直线推进的思维论证方式也一目了然。论者先是把现实性极度约简使之缩小到只剩下与政治等同的“战斗的现实内容”，然后又将“政治内容”尽量夸大使其膨胀到足可和现实性内涵外延重合。对此，正如前面所说，杭约赫在《编余小记》中表示：“新诗距离结论性的时刻尚远”，容许和欢迎自由讨论，措辞委婉但态度明确。九叶诗派坚持开放性观点，认为现实具有广阔性、丰富性、深远性，“如其单单着眼于时代与政治就会形成狭小范围，限制了新诗发展多方面的可能性。”[13]生活日新月异、变幻无穷，现实并非只有“政治内容”固定的一副面孔。《诗与现实》[14]一文作者认为现实在进行理论抽象时可析分出现象现实与本质现实。现象丰富多样，本质独一无二，这唯一本质才是现实中的真实也即真理，相当于隐藏在生活背后有脉胳可寻的社会趋势和历史规律，诗与现实的联系是要与“本质现实”保持同步而不应被现实现象所迷惑。作为诗人，“首先要虚心的追究一下，所抓住的那点东西是不是结合在整体之内向着总的方向前进。”这里，论者没有将诗人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必然融注进去的情感态度考虑在内，而把写作对象与写作态度混为一谈，分辨不清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对审美客体有照亮的功能（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或反过来），无形中对现实作了等级的划分和限定。他继续说：“不是的话，那就不是现实，只是已经死亡的或者行将死亡的东西”，似乎只有新生事物才有权利在诗国昂身阔步、凯歌行进，一切衰亡的东西连成为诗的表现对象也缺乏资格，这与“其二”的现实观在精神上榫合了。邵荃麟也表示：“所谓真实(Truth)的另一含意即是真理，真理却只有一个，而它总是站在时代斗争前面的广大群众中的。”[15]

这里的“真实”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真实与历史真实，以此来规范诗歌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同样陷于简单化。40年代左翼诗评家劳辛把诗歌抒写的生活理解为“历史发展中的最本质真实的社会关系，和最崇高的生活”，并因此批评九叶诗派追求“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剖析”的创作为“吟风弄月派的复活”。[16]九叶诗派认为现实具有引申义，除了正面之外（“正面”大约等值于上述“政治内容”、“本质现实”和“真理”），尚有侧面、背面，尤其是内面。诗不仅要描画现实的脸谱，还要刻画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它的姿态、阴影,特别是精神。唐湜就反复强调,反映现实的诗可以没有一一落实的历史故事,但心须是那一时代精神品格的升华,像弥尔顿的《失乐园》,里面有清教徒革命的魂魄。

九叶诗派不迷信语言的魔力,不愿在词语上制造紧张,对人为规定现实边界从而否定现实的复杂广阔性的观点表示"不能完全同意";认为题材可有大小轻重之分,表现上也允许先后缓急,但不该划定禁区,框束范围,设立等级。他们在"平衡"原则指导下对现实予以新的诠释,并且说明诗"反映现实,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道理。其开放性的现实观是立体的:内涵深化了,外延扩展了,层面幅围都大大丰富了。现代生活本非一些单纯的观念信条所可包揽无余,因此,"只能用复杂错综的情绪,多方面地(而也就更有力地)发挥诗的功能。"⑰本质并不唯一,诗要刻划现实的各面"真实";"真理无处不在,在政治意识里,也在日常生活里";⑱生活、真理与诗同在,"'那里有生命,那里便有诗'。诗不一定只生长在血和火里,平凡的生活里,也一样能有好诗";⑲"对人生百态的刻划,对一切问题深思苦索,这岂能与时代无关。"⑳斑驳的生活里有悲剧也有喜剧,从喜剧的写作中可能引出深广的悲剧天地,九叶诗派对国统区"丑角的世界"的绝妙写生至今不还有"立此存照"的良好效用吗?"鼓声、号角"固然是时代进军的黄钟大吕,"当黑色的翅膀时时在身边闪动",发自衷心的"呻吟、低唱"也可以是艰难时世的慨叹、感喟。甚至宕开一步,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超越追求和玄远沉思,虽然没有直接描写现实,也都与风里雨里血里火里的时代明暗相通,不失为诗人痛苦的心灵撞击在山坳间曲折的回响。形神一体孕育出活跃的"生命",天高地远人间才气象万千。

进入历史:诗人论

"人底二元性与诗的二元性原都与生俱来,社会意识与个人价值虽遥遥相对,却未必不共戴天。"㉑整个20世纪40年代,无论战时战后,大而国家命运、小而个人遭遇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不可能的如今变为现实。几乎同时,异域的中西诗人由于相同的际遇,达到了相近的"觉识":悬隔许久互不知悉的两个领域开始了交融的过程,私人感情与公众生活空前"亲和",人不再像大海中的孤岛天各一方、远离人群,诗也不再仅仅返观自身,它开始面向全社会、全人类。"公众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像春潮时海水冲进了淡水池塘将一切都弄咸了一样","和我们同在的公众世界已经'变成'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经变成公众的了。"㉒置身争取民主进步斗争中的中国诗人,探求着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的道路,希求"个体生命与诗都在二者之间作曲线前进,以痛苦换取调和,从成长仰企成熟。"㉓九叶诗派一方面要求确保诗作为诗人个体创造物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在诗中舒卷时代风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应。诗人要面对自己,置身社会,坦然迎接"八方风雨",做到"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将艺术的个性与社会性统一,避免危及"平衡"的两种倾向,而这是记忆犹新的事实。朱自清说:"我国抗战以来的诗,似乎侧重'群众的心'而忽略了'个人的心',不免有过份散文化的地方。"㉔功利追求超过了艺术琢磨,趋众心理严重,诗味寡淡。冯至晶莹深沉的《十四行集》受孕于一次次"诗的散步",是从日常生活风景上浮升起的一片幽遽静独的沉思,主要"关心人在一个有敌意的宇宙里的处境,……"㉕原始倾向和超越追求淹没了对现实苦难的关切,又不免侧重了"个人的心"而忽略了"群众的心"。美国现代诗人麦克里希的一席话可移用于此,对证着中国40年代的现实㉖:如果我们作为社会分子的生活——公众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可以引起我们私人的厌恶……恐惧……私有的希望;那么,我们……只得说,对于这种生活的我们的经验,是有强烈的、私人的感情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便是诗所能使人认识的经验了——也许只有诗才能使人认识它们呢。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公众生活大踏步地"侵犯"到私人生活的畛域,足可引起个人情绪的复杂变异;公众生活业已具备强烈的私人感情的经验性质,因此,它们取得了艺术反映的资格;并且,在恰如其分方面真的"也许只有诗才能使人认识它们呢"。九叶诗派一向主张人生和艺术两不偏废,特别强调诗人在如此伟大又如此复杂的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代写诗应坚守平衡立场，具备高度自觉的精神；忠诚于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受，“力求个人情感和人民情感的沟通”，使诗的个人独创性与社会意义、功利性与艺术性融洽统一。袁可嘉阐发诗剧的“综合性”时也涉及二者的融合：既要“争取现实主义倾向”，又“不至粘于现实世界”；“从个人自觉意识取得起点”，而“以理想社会的出现为其归宿”，实现“极度个人性里有极度的社会性，极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里有同样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27]九叶诗派是严肃思考的诗群，他们要求认清时代，认清艺术，认清自己所从事的诗歌活动的性质与目标，时代离开了人便成真空，人离开了自觉意识便成木偶。他们崇尚的现代诗人不再止于自我表现，还应有“自我认识，自我分析”的能力，既不迷失，也不盲从；他能够辨别进入创作状态的诗人与日常生活中的自己的分合，能够辨析社会意义与个人价值的矛盾统一，更能清醒地“觉识”公众生活中的什么因素、通过何种途径、经历哪些中介环节而转生成了浸泡着强烈感情的私人经验。他们呼吁：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就是自觉，是信心的坚定与真挚的坚持，因为艺术创造必须归结到艺术家对自我本色的觉识与把握。那些流行的诗的膺品正属于非自觉的写作，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个体与社会的割裂，对“个人的心”的蔑视、疏忽和对“群众的心”的盲目依从。缺乏自觉意识的诗人，要么走向自大的迷失，要么跌入自卑的盲从。自觉意识既指诗人对生活明察秋毫，亦指诗人对感受体贴入微，清醒的心神状态与严肃的创作态度是构成自觉精神这枚“分币”的两面。

有一份真，才有一份美，主观之“真”就是“诚”，诗人对于自我感觉、感触、感受的诚挚程度也是决定其创作成败和影响艺术感染力的重大因素之一。九叶流派提请注意这样一种过份轻易的“通电”性质的诗坛怪现状：一些未经生活感觉过的抽象信仰一经确定，立即与作者长期以来浸淫其中习为常的某种特殊情绪储藏库通起电来；黑热的情绪就像冲破闸门的洪峰，汹涌澎湃，电门一开，诗篇完成。明显的主题先行和观念演绎的创作方式，毫无诚意可言。古代西哲就说过：欲使艺术表现的情感令人信服，先要自已信服，要让别人感动先要自己感动。他们由此及彼顺藤摸瓜，从认知心理上找到了“口号化，公式化，长吁短叹，捶胸顿足，种种奇怪现象层出不穷”[28]的病根。在当时诗坛，他们时刻警惕生涩的观念教条窜入诗中搔扰诗情的表达。他们从这一意义上提出，“虔诚就是诗”，而“感伤”就不虔诚。

诗是诗人开向人间的艺术花朵，它的萌孽固由诗人心血催发，但广阔的人民生活、充沛的时代风雨方为其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诗人“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29]历史的人写出个人的诗，这诗也必定是时代的歌咏，因为历史长河里流动翻滚着人民世世代代的哭泣、挣扎、绝望、企盼、抗击、奋进……忠于自己、尊重艺术与忠于时代、热爱人民并不悖逆冲突，在历史的河流里，它们息息相通。九叶诗派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让时代的声音在个人心中化作一片严肃的颤动，严肃地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联。在《力的前奏》一诗中，宇宙里“力的律动”对照着时代风暴的即将降临，个人心绪感应出历史意志便是很好的作品证明。他们对诗的个人性与社会性(诗与现实的转化形态)的理论设想和理想期待与此相同：“诗人在写作的时侯，他们是自己的一帖解药，可以解掉群众心理的影响：他们将孤注押在自己这个人身上，这个自觉的人身上，这个面对自己的人身上。这样做时，他们就表显怎样为人类作战。”[30]

探究本体：艺术学

九叶诗派将自己划归“人的文学”麾下，信奉“生命本位”与“艺术本位”的文学观，一再重申“诗是诗——诗就是诗，诗只是诗”的艺术立场，突出艺术自律性的一面，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他们追求“平衡”，“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还成为诗，而且是好诗。”[31]

对诗与现实关系的认识原则适用于对诗与政治关系的说明。“在我们的时代里，人的命运是在政治术语中呈现其意义的”(托马斯·曼语)。在这一问题上，九叶诗派的论述时有闪光之处。现代人民政治远非密室策划与官廷阴谋一类，不再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政治家和政客们独占的专利,具有既深且广的渗透性与涵盖力,但即便如此政治也只是现实众多因素的一部分(或许是极重要极特殊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诗的政治性是它的社会性的一面”,他们“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关系,但绝对否定二者间有任何从属关系。”[32]诗脱离政治,既不可能,也无心要,相反,它会引发两个不良弊端:一、“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容易造成艺术的虚假;二、“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33],都是对艺术的无形杀伐与戕害,有违开放性的“现实观”。他们要求诗与政治:平行,齐头并进;平衡,和平共处。

九叶诗派看艺术为有机生长着的生命体,有本身的价值与绵廷的传统。他们站在“人的文学”立场批评“阶级本位”与“工具本位”的“人民的文学”,认为后者有政治高于艺术甚至取代艺术的倾向。后者的拥护者声称:“艺术服务于政治这个基本的原则,大抵都是同意”,“政治,……它和艺术的关系,不是对等的。而是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过来促进前者的一种关系。”[34]政治决定艺术,艺术为政治服务,在形势险恶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对艺术单方面的轻视和放弃,把艺术看作政治的拖累,滋长“要战斗性强就只能牺牲艺术这一种成见。”[35]还有一种观点是在增强政治色彩和战斗性的前提下有限度地肯定艺术审美。与九叶诗派颇为接近的黎先耀先引用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文学“永远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作为正面论据,然后再绕回来谈政治诗的艺术性问题,主次关系分明。[36]诚然,“政治是一般上层建筑的基层”,在生活中发挥着远比文学为大的作用,在现代,政治高频率地强行楔入已多次迫使文学发展改变航程,以求调整适应。但是,事实屡屡如此却并非意味着那就是不灭的规律与真理,从逻辑角度推不出政治决定文字的结论。

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判定文艺是宣传的工具,认为文艺可导致直接行动,较少注意文学的本身特征。九叶诗派恰恰相反,侧重从文学本身、从文学内部特点、从文学特殊规律来讨论诗的政治性,坚持认为一切以“诗”的神圣名义进行的活动心须具备艺术性质与采取艺术方式。他们承认诗有工具、武器的作用,但认为不能片面地理解和过份迷信,而且只有通过艺术才能有效达到目的。在“文学与社会学挤眉弄眼”的情形下,他们忧虑新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日渐丧失本性的前途,提出文学品质是包含时空又超越时空的存在,诗只有在满足了艺术的先天的绝对的条件后才成其为文学。作为新时代的艺术作品,现代诗歌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包容人生经验的深广和表现的精妙,诗只有功用上的大小之分,性质与价值本无差别。在他们渐成系统的论述中,相当一部分是批评新诗现状与检讨历史,他们尖锐地指出:“仅凭主题——无论是政治观念,纤细感觉,或抽象思维——都不足以赢得诗的效果”[37],这正是阻碍进步的新诗病态三大主型。他们还认为,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诗的迷信表现,其原因皆起于混淆了不同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在对诗的构成因素之一的失度的夸张中歪曲了诗的本质。九叶诗派正面诠释诗是点、线、面结合而成的立体组织,其艺术效果由内部结构组织中产生,并非单纯依赖题材的重大或思想的先进。

由中国社会历史特点所决定,20世纪40年代新诗“何去何从”的发问最扣人心弦处依然莫过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诗与现实、诗与时代、诗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处置与摆正,每个诗人与理论家都必须对此作出富于说服力的解释。艾青认为抗战以后“中国新诗,已走上了可以稳定地发展下去的通道;现实的内容和艺术的技巧已慢慢地结合在一起。新诗已在进行着向幼稚的叫喊与庸俗的艺术至上主义可以雄辩地取得胜利的斗争。”[38]虽然历史证明乐观得过早了一些,但不论新老诗人和不同诗派,起码是其中的多数,都对新诗发展进行过反思,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接近健全的共识,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同新诗必须关怀时代与现实,对国族与社会拥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在历史巨变的时期,诗既是助推器,也是记录薄;同时,诗人还对诗歌的艺术品质与审美属性也予以公开承认,浮泛地描摹现象、以叫嚣为战斗的风气受到质疑与反对。大家都认为应该尽可能深入现实并将这种书写提升到诗艺术的境界,即使是注重综合思维、致思“新诗现代化”的现代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主义诗人也在时代思潮激荡下，显著强化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寻求超越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新途径。当然，40年代后期，伴随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日趋明朗，这一包含了良好“综合”愿望的格局渐被打破，但努力争取和勉力维护某种程度的“平衡”仍是包括九叶诗派在内的诗坛重要趋向。九叶诗派寻求二者平衡的愿望与用心是区别于其他诗人、诗派的第一个特征，也是其理论焦点之一。

注释：

①袁可嘉：《诗的新方向》，《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23页。

②杭约赫：《编余小记》，《诗创造》第1辑。

③辛笛：《〈辛笛诗稿〉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页。

④唐湜：《我们呼唤——代序》，《中国新诗》第1辑。

⑤杭·祈：《编辑室》，《中国新诗》第2辑。

⑥唐湜：《穆旦论》，《中国新诗》第3、4辑。

⑦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见《新意度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⑧袁可嘉：《诗的新方向》，《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20页。

⑨叶公超：《文艺与经验》，《今日评论》第1卷第1期，1939年1月1日。

⑩袁可嘉：《新诗现代性——新传统的寻求》，《大众报·星期文艺》，1947年7月30日。

⑪陈敬容：《和方敬谈诗》，《诗创造》第12辑。

⑫许洁泯：《勇于面对现实》，上海：《诗创造》第2辑。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迫使我的政治方面脚踩大地的是现实本身，是相信至少在拉丁美洲，一切始终都将是政治。改变那个社会的任务是如此迫切，以致谁也不能逃避政治工作。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很可能和文学志趣都从同样的源泉汲取营养：即对人，对我周围的世界，对社会生活本身的关心。”“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不积极参与政治是一种罪过。”（以上两段引文均转引自刘继明《走近陈映真》，海口：《天涯》2009年第1期）詹姆逊也说第三世界的文学无一例外地成为民族寓言。但他们从未否定文学表现政治可以不经过艺术转化，即使马尔克斯也只是从“归根到底”的立场认为“现实本身”“将都是政治”，也承认了“将是”中的时间转化作用，而没有表述成“现实即现实”的直接等同式。

⑬陈敬容：《和方敬谈诗》，《诗创造》第12辑。

⑭蒋天佐：《诗与现实》，《中国新诗》第1辑。

⑮《邵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

⑯劳辛：《诗的生活、生活的诗》，《诗的理论与批评》，上海：正风出版社，1950年，第37页。

⑰默弓（陈敬容）：《真诚的声音》，《诗创造》第12辑。

⑱陈敬容：《和唐祈谈诗》，《诗创造》第6辑。

⑲杭约赫：《编余小记》，《诗创造》第9辑。

⑳陈敬容：《和方敬谈诗》，《诗创造》第12辑。

㉑袁可嘉：《诗的道路》，《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25页。

㉒[美]麦克里希：《诗与公众世界》，朱自清译，见朱自清《新诗杂话·附录》，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22、123页。

㉓袁可嘉：《诗的道路》，《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25页。

㉔朱自清：《诗的趋势》，见朱自清《新诗杂话·附录》，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67页。

㉕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北京：《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㉖[美]麦克里希：《诗与公众世界》，朱自清译，见朱自清《新诗杂话·附录》，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22、123页。

㉗袁可嘉：《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天津：《盖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月18日。

㉘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2页。

㉙唐湜：《我们呼唤·代序》，上海：《中国新诗》第1辑。

㉚转引自朱自清《诗的趋势》，《新诗杂话》，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63页。

㉛袁可嘉《诗的新方向》，《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20页。

㉜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4、5页。

㉝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4、5页。

㉞邵荃麟：《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6、107页。

㉟郑敏：《唐祈诗选·序》，青海：《青海湖》1988年第5期。

㊱黎先耀：《论政治诗》，天津：《大公报》1947年9月6日。

㊲袁可嘉：《诗与主题》，《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81页。

㊳艾青：《北方·序》，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陈建宁）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